

斯特朗：半生笔墨书『华』章

□ 董大伟

（1946年）8月，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满怀信心地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十分坚定地说，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11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著名进步记者、作家和诗人。从1925年起，斯特朗先后6次到中国采访并最终定居中国，花费半生笔墨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故事播向世界，打开了对外宣介中国共产党的一扇窗户。

将中国工农武装革命运动介绍给全世界。1925年，40岁的斯特朗首次来到中国，见证第一次国共合作下全国范围内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在宋庆龄的建议和帮助下，斯特朗顺利抵达广州，对省港大罢工进行现场报道。她还采访了时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将发生在广州的中国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报道给全世界。

颇有戏剧性的是，当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访问中国时，也目睹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这次在华期间，斯特朗报道了中国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国内战争，蒋介石、汪精卫对国共合作的肆意破坏，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革命失败。此外，她还深入湖南农村，对那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进行报道。

斯特朗将前两次来华采访见闻写进《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一书，对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给予高度评价：“有勇气把中国从中世纪推进现代世界的，将不会是那些北方或南方的将军们，不会是那些富有而又卑躬屈膝的上海资产阶级，不会是那些胆小怕事的政客和官僚们，而必定是这样的工人和农民。”

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人民战争。1937年底，第二次国共合作刚促成不久，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的重要关头，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在此之前，美国另一位知名记者

斯诺对红军长征以及西安事变的报道，深深吸引和影响了斯特朗。她决意将这次采访的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晋西北的八路军总部，她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这样一支新型中国军队有了近距离观察，并积极向世界进行报道。在第三次访问中国的基础上，斯特朗完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大力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人民战争，并作出“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预言。

向国际社会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幕后英雄。1940年底，斯特朗第四次到中国访问，再次见证了蒋介石蓄意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诺最早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在美国报道，但是为了封锁皖南事变的真相，国民党进一步加紧对外宣传的新闻检查，反而污蔑斯诺造谣，取消了他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

在此之前，斯特朗1940年曾在重庆对周恩来进行采访。周恩来将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一些材料交给斯特朗，并希望她适时发布。1941年2月，中国共产党写信告知斯特朗尽快公开上述消息。经过一番周折，斯特朗将这些冒险带回的珍贵材料，交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记者并以后者名义发表。斯特朗在美国促成和发表的相关报道，与斯诺早先的报道相互印证，合力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力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斗争。1941年3月，在国内外舆论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取消反共计划，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得以退去。

对外系统报道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访问。她跟随驻扎在共产党辖区的一个美军观察组，获得从北平到延安以及其他共产党控制区域进行经常性“观察”飞行的机会，走访足迹几乎遍及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东北解放区等共产党全部控制区域。

在延安，她先后采访毛泽东、刘少奇等共产党领导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毛泽东同斯特朗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她将其发表在纽约《美亚》杂志上，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便闻名于世。她还在纽约《美亚》杂志发表《毛泽东的思想》一文，首次系统地吧毛泽东思想介绍给全世界。

此外，斯特朗将第五次访问中国的见闻编写成《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记载了1946至1947年间她在解放区所见各方面卓有成效的政策，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有了深入了解。

架起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桥梁。在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多年的采访中，斯特朗深受感动，曾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1958年，73岁高龄的斯特朗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第六次来到中国访问，并定居北京，实现多年夙愿。

定居中国以后，她不顾年老体弱迅速投入到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中，先后深入中国农村乃至西藏实地采访，完成《中国为粮食而战》等新闻作品，用余生坚持不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播向世界各地。

晚年斯特朗在中国主要从事的另一项工作是编写《中国通讯》。1962年，为了弥补在美国发表文章渠道的不足，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她每月撰写一篇关于中国的综合通讯，寄给国外那些希望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中国通讯》第一期只印了60份，之后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报刊纷纷转载，一度以6种文字发行超过4万份。直到斯特朗逝世，《中国通讯》累计刊印69期，成为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六次访问遍中国，半生笔墨书‘华’章”，这是斯特朗40多年不遗余力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国际宣介的生动写照。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遗体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十三根铁链劈开通往共和国之路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碑文敬读

□ 张成乐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坐落在四川省泸定县泸定城河西沙镇，由邓小平题写碑名，聂荣臻撰写碑文，两位老一辈革命家同时题名撰文的纪念碑，十分罕见。纪念碑由主题碑、底座铜像、碑基平台及地下室三部分组成。纪念碑高30.35米，用钢筋混凝土浇灌而成，碑前台阶高2.15米。主碑运用铁链的几何变体，象征着革命的武装斗争，底座平台又着重表现红军战士日夜兼程急行军后疲乏而又顽强的战斗姿态。远观主碑，如凌空发射的机枪，象征着“枪杆子里出政权”；近看碑体，凹凸有致，环环紧扣铁锁链。碑内分八层，每层均装饰了藏汉团结、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大幅壁画。碑身正面上方是邓小平题写的碑名——“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侧面镌刻了由聂荣臻撰写的纪念碑文，内容如下：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取得了飞夺泸定桥的重大胜利。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毛泽东同志在安顺场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的。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沿东岸北上赶向泸定桥；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红一军团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红五军团，沿西岸北上赶向泸定桥；两支部队相互支援，夹河而上，相机夺取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的先头部队是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的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党总支书记罗华生）。他们受领任务后，立即紧急开进，一边走，一边消灭沿途遇到的敌人，第二天一昼夜夜强行军二百四十里，按时赶到泸定桥，并组织了二十二人的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奇绝惊险地夺取了泸定桥。

一师和干部团不断击溃和消灭河东岸沿途的敌军，对四团夺取泸定桥起了策应作用。

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成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反革命迷梦，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这再次体现了我英雄红军无限忠于人民革

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
红军的功勋永垂不朽！
红军精神万岁！

聂荣臻

碑文500余字，记录了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事迹，强调了中央红军胜利夺取泸定桥的重要意义，再现了红军战士们昼夜疾驰240里后，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战斗夺取泸定桥的战斗过程，彰显了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伟大长征精神。

昼夜行军二百四十里

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达安顺场。在听取了刘伯承的汇报后，一致认为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大渡河，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然而后有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显然全军从安顺场渡河已不可能。所以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以一部从安顺场渡河北上，大部沿左岸攻击前进，左右夹击夺取泸定桥。对红军来说，夺取泸定桥关乎生死存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此，毛泽东下达了死命令：左纵队必须在三天内，右纵队必须在两天半内赶到泸定桥。

5月28日清晨，在山路上艰难前进的红4团接到上级新的命令：要求其必须在29日夺取泸定桥。时间只剩20多个小时，要走完剩下的240里山路，赶到后还要立即发起战斗，任务何其艰巨。“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立即成了全团指战员最响亮的口号和最坚定的信念。伤痛、疲劳、饥饿都被用到了另一边，红军战士们心中只有两个字：快走！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淖继续前进。经一昼夜疾驰，红4团按时赶到了泸定桥，随后一边休息，一边等待重武器的到来。

一寸铁索一滴血

泸定桥全长约102米，宽约3米，离水面有好几丈高，由13根铁链组成，其中9根作为桥面，4根作为桥栏。当时川军已拆去了约80余米的桥板，并用机枪、迫击炮在东桥

头高地组成火力网，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中午，红4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组织了由第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2名夺桥勇士突击队。与此同时，右路军沿着大渡河东侧攻击前行，有力地配合了红4团的行动。

红4团还组织了两个营分置于桥头两侧，用以压制对岸火力，掩护突击队。一切准备就绪后，5月29日下午4点，突击队向泸定桥发起了进攻，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亲自站在桥头指挥战斗。司号员吹起冲锋号，两个营猛烈开火，压制川军的反扑。与此同时，22位勇士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3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勇士们听到呼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听到口号声后，他们更加奋不顾身，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和城里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激战两个小时后，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都狼狈地逃跑了。战后，为了表彰红4团所建立的功勋，中革军委给突击勇士们颁发了奖品：每人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这在当时，已经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了。

大渡河畔丰碑永存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两侧的22根花岗岩石柱，分别代表着22位夺桥勇士。当时规定：凡是干部，包括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及排长，首先要挑出来；曾经是战斗英雄的，比如在强渡乌江战役中立过功



的，也要挑出来；还有平时作战勇敢的。挑选出来的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码也须是入党入团积极分子。突击队的任务是2连连长廖大珠抢下来的，所以就由其担任突击队的队长。

在夺桥战斗中，第一个冲上桥头堡的连长廖大珠，在后来的解放西北战斗中血染高原，还有李富仁等4名战士英勇牺牲。

在激战后的泸定桥上，刘伯承曾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踩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用“大渡桥横铁索寒”来形容红军飞夺泸定桥之艰险。飞夺泸定桥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里程碑，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不朽的篇章，有着“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巡视检查工作巩固中央苏区红色政权

□ 李成林

巡视检查工作是党的传统，在中央苏区时期便已开始了早期探索。针对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思想上加强教育，严惩腐化堕落分子，制度上加强立法、监督，开展巡视检查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遏制了官僚主义作风和腐化堕落现象，巩固了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外部面临反动派派往苏区军民“不战而自亡，未剿而先灭”的图谋，内部各项制度还不健全，成员思想复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和贪污腐化问题，威胁着红色政权的生存发展。

中央和地方在巡视中发现的问题，首先是存在官僚主义，工作敷衍塞责。有些地方苏维埃政府执行上级决议不坚决，致使政令不畅。其次是开支随意，缺乏约束。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有个别政府工作人员存在追求个人享乐或打土豪所得财物未按规定上缴等现象。再次是贪污公款。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困难作出了巨大努力，但仍有人利用手中职权贪污公款，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

中央苏区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如果不重拳惩治，党就会在思想上、组织上涣散，威胁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加强和改进巡视检查工作，雷厉风行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惩治腐败斗争。

1931年5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中央巡视条例》，阐明了巡视工作的四项主要内容：一是查找工作中的具体错误和不足，并提出改进意见；二是严格检查巡视地区的领导架构和工作方式；三是考察当地政治经济状况；四是发现和培养工农干部。巡视员是中央的代表，必须对中央绝对负责，“生活必须下层化，经济必须节省，做一般同志的模范”。各个省都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建立起符合本地实际的巡视制度。

1932年1月12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巡视瑞金工作，决定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巡视工作计划。毛泽东到瑞金县蹲点，指导巡视检查工作。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临时最高法院主席何叔衡上任后不久，在深入地方巡查暗访中查明，云集区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敛财至上千大洋，1932年5月9日对其执行死刑，打响了反贪的第一枪。

1933年1月1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决议，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健全巡视工作制度，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走群众路线。1933年7月11日开始，苏区中央政府各部派员巡视南线八县，土地部和工农检查部派人巡视北线九县，土地部派人巡视闽赣省，巡视检查工作逐步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的轨道。

1934年1月，中央工农检查部升格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项英兼任主席，巡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中央政府组建了中央反贪污浪费突击队，开展了大范围、多方位的反贪污浪费的巡视检查。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4月到7月，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共计节省经费130余万元。中央政府反贪污浪费的经验被地方各级政府借鉴，巡视检查进行得更加直接、频繁而严格。如查处的中央苏区“惊天第一案”于都县集体贪污窝案，4名贪污犯被判处死刑，其他犯罪分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巡视检查的红色“钦差大臣”深入细致，苏维埃政权的“尚方宝剑”凌空高悬，中央苏区卓有成效的巡视检查工作，使消极懈怠现象无处隐匿，贪污腐化人员受到有力惩处，收到了巨大成效。1934年9月，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自豪地宣布，“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

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巡视检查的成果，首先是贪腐分子得到严惩，减少了贪污浪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苏区人民踊跃参加节省运动，支援苏维埃革命斗争，缓解了一时的财政经济困难，粉碎了反动政府的“杀死政策”和“饿死政策”。

其次是转变了苏区干部的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巡视检查的意义不只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刀上，更重要的是通过自我革命，倒逼工作作风的转变，培育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增强了其为民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卓越政治品质，提高了苏区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感与信任感。“这一成绩比节省的金钱还要大，这是伟大的成绩，不能以数目字估计的。”

最后是纯洁了革命队伍。苏区干部廉洁自律，一心为公，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军民一心，构筑了胜利之本，经受了残酷的考验，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各级巡视员也在血与火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了磨练，成为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并为以后党的巡视检查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